

南匯縣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輯

南匯縣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

一九九三年七月

南汇县文史资料第十辑目录

策动周浦自卫队起义的经过	张信民等 (1)
我参加泥城暴动等革命活动的回忆	王妙仙口述 (7)
漫谈淞沪游击第五支队及新四军淞沪支队 各部的名称及其他	鲍季良 (11)
记一次特殊的露天宿营	陈友新 (14)
其成乡得名的由来	鲍季良 (16)
鞠躬尽瘁 忠诚一生 ——记邱忠民同志二、三事	王祖望 (17)
郭毅生平纪略	郭 健 (22)
1946 年被捕经过	秦克强 (24)
难忘的日子 (附南汇县团组织史料一则)	秦金华 (28)
浦东“野”诗人——丁宜福	王作九 (31)
回忆黄炎培先生	秦引姊口述 (36)
倪志康昆仲事略	倪拜言 (38)
南汇简师杂忆	嵇德隆 (40)
城厢维勤中学简史	顾燕荪 (43)
曾在我县兴旺一时的农业中学	陈安富 乔志清 (45)
南汇灶门港的来历	陆正杰 (48)
简述周浦镇旧商会	朱惟洪 (52)
漫话新场镇东狱庙及三月廿八庙会	廷山、乙生 (56)
更正一则	(60)
南汇县政协文史资料 1-10 辑总目录	(61)

南汇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二年七月

策动周浦自卫队起义的经过

张信民

1948年秋，我人民解放军遵循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国民党主力大部被歼，残部溃退至长江以南负隅顽抗。坚持战斗在敌占区的人民武装及革命力量，为配合大军过长江解放全中国，也积极开展各项活动，以牵制打击敌人。我和郭雪鑫、顾全坤三人在浦解总队路北区委的直接领导和周浦地区地下党组织及外围组织的支持下，自1948年秋至1949年4月，在周浦自卫大队中全面开展政治形势宣传教育活动，团结争取群众，分化瓦解敌人。促使自卫大队全体人员携带枪支弹药光荣起义顺利参加了我革命队伍。为南汇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接受任务

1948年7月，浦解总队路北区“英勇”中队区委书记兼中队长张震言同志，亲自对我们三人（编者接：即张信民、郭雪鑫、顾全坤三人。他们都是以前周浦自卫队队员作掩护的地下同志）为策动周浦自卫大队起义作了详尽的布置。他语重心长地反复交代我们：一、要坚持走群众路线，重点宣传政治形势，及时进行政治攻势，争取更多力量团结在我们周围，共同做好全体自卫队员的思想转化工作。二、运用各种手段，创造条件向自卫队队长陆家禄宣传解放军“优待俘虏、将功折罪”政策，晓以大义指明前途，继面试探他，最后策动他。三、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的一切矛盾，甚至制造矛盾，加以扩大，促使陆家禄只有走上起义的道路。条件不成熟，决不硬拉走队伍。

（二）计划行动

我们三人从中队部回到周浦镇后，由我主持在顾全坤家中举行第一次秘密会议，根据当时周浦自卫队的情况具体研究行动计划。大家一致

认为，周浦自卫队的队员、干部都是商店小开、职工，思想散漫，行动不一致。特别是队员的枪支绝大部分分散在队员店内或家里，所以应该尽快设法把这些枪支集中，同时，自卫队部设在中大街（周浦中心）对搞起义行动、拉走队伍枪支等很不方便，应尽快设法把队部移驻到镇梢上去；自卫队长陆家禄，自开良利堂药店，全家在镇上，平时胆小怕事，处事缺少果断；另外他对奚八房打死陈关华事件一直忧心重重，因而陆的思想和家庭包袱很重，我们应耐心帮助，积极争取。

同时应该对当时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新四军根据地、游击区的活动消息，和共产党的政策等积极进行宣传。通过同队员、干部运用串门子，同路散步、扯家常等形式进行谈心启发，并在各镇、街道张贴《新浙东报》、传单、捷报等宣传品，使敌人军心动摇。我们必须广交朋友、多方接触，把群众团结在我们周围，争取更多力量配合我们一起工作。力争在1949年春创造好条件，及时举行起义，把队伍拉走。

组织分工上：我负责全面组织工作和开展政治形势宣传教育活动，统一部署行动，组织战斗；郭雪鑫重点负责集中自卫队枪支弹药等装备，及时和张震言中队长联系，取得他的指示；顾全坤是自卫队队副，他与陆家禄关系密切，为此主要由他做好陆的思想转化工作。

（三）发动群众，制造气氛。

通过一段时期的宣传教育活动，许多队员都主动向我们靠拢，对陆家禄的工作，也很有起色。1948年冬，我们利用自卫队夜间巡逻的机会，分工散发有关宣传品，有的贴在全镇街、弄、通口、桥头，有的塞入商店门缝中。至明晨，周浦全镇顿时议论纷纷，都在说：昨夜解放军活动到周浦街上来了。敌军政人员看到宣传品后，有的撕下来交给反动头目，大多则相互窃窃私议，敌人军心惶惶。一天深夜，顾全坤在大门口查哨，一名敌军官由横堂弄向北走来，顾故意大喝：“口令！”敌军官吱唔不答，顾不问情由，朝天鸣枪，喝令“停步”，敌军官吓得拔脚就跑！事后，敌军官带了一队士兵前来寻衅，形成一场风波，结果不了了之。1949年1月底（农历正月初二）深夜，时值全镇戒严，顾全坤在一家楼窗口（中大街垃圾桥附近）举起汤姆枪扫了一横子子弹，附近敌

军闻声慌忙赶来，询问何事？顾说，发现形迹可疑者多人，在桥上指手划脚、私议，喝令他们站住不听而逃，故扫射了一梭子子弹。“国军”听了惊慌失措，四出巡戈而去。1949年春，周浦镇公所军民合作站（专供“国军”粮食、柴草、蔬菜等物资而设立的机构）拖欠了周浦各商行、摊贩的货款约数百石大来代价，各业主无不冤声载道。我们即以“新四军周浦地方民兵队”名义，发出两封警告信和贴出一张通告，勒令周浦镇公所立即归还此项债款，违者格杀不贷等。吓得镇公所惊慌万状，立即归还了大部欠款。

（四）转化陆家禄

一天，顾金坤邀约陆家禄、朱大可到上海指子饭店，白天出去游玩，晚上顾金坤用担心的语气对陆提出：人民解放军已逼近上海，周浦自卫队闯下了打死陈关华的“奚八房事件”，欠下了共产党的血债！我们都逃不脱罪责。并且我们都是周浦人，今后还要立足周浦做生意呢！……我们应该现在就要考虑出路问题了！那时国民党军队可以一走了之，而我们跑到那里去？朱大可听了也担着急地说：“老陆，怎么办”？陆听了沉思不语，最后说：“我比你们更加着急”！说毕，长叹一声又说：“只有听天由命了……”！并自言自语说：“数代家业，百年老药店良利堂！我们一家老幼都在周浦……，今后怎么办？做人有什么意思！……”。

一天晚上，陆自动到顾金坤处，闲谈中他流露出不再干自卫队队长的情绪。又一天晚上大家在自卫队队部中闲谈家常，陆也在。大家谈到“奚八房事件”时，不少队员提出，要想法找亲访友，打通走共产党、解放军的门路，暗中配合解放军做些有益的工作，或许可以将功折罪，继续立足周浦做生意……。开头，陆一声不响，后来着有所悟的说：“苦无门路，怎么办？”大家都说：“只要队长允许，我们千方百计寻找门路，”陆当时大有默允之意。

过了几天，我和顾金坤在陆一起时谈到：最近，眼看一船船、一车车大朱、被“国军”从周浦拉走，我们周浦自卫队，说是要保卫周浦商民利益的，但是现在，连哼多不款哼一声，真是气死人。此时有些自卫队员插嘴说，我们拦他们下来，有的自卫队员说，把公路桥烧掉，将或塘

河填断等着他们怎么运走。此时我就向陆提议，今晚，我们去烧毁周浦北面的公路桥，队长，你答应吗？顾伯坤接着说：汽油，我去救火会拿来（他是周浦三义阁救火会的司机和仓库保管员）。陆沉默不语，紧促双眉，良久，他终于下了决心说：“好，干一下！”此时群情振奋立即行动。顾伯坤即去取了两桶汽油，陆主动带领顾金坤等九人全部便衣，悄悄出发，我们以出防巡逻名义，至一王庙南面，先由顾金坤，顾伯坤弄到一条船，把它撑到咸塘河东岸，一齐动手挖泥装了一船，然后在石桥下把船凿破沉入河底，接着，很快赶至公路桥（即营房桥），把汽油浇在桥上纵火烧桥，顿时火光熊熊，我们躲在近处窥视，见桥烧得差不多了就悄悄返回队部。至明晨，群众到处议论纷纷说：“昨夜新四军将公路桥烧了，咸塘河也被填塞了！……”。吓得敌军政人员惊慌万状乱作一团。

通过宣传教育及形势的急剧发展，陆家禄的思想已有所转变，对自卫队队部必须迁到南八灶视家港附近的中信布厂空厂房内的提议也已有同意的表示。1949年3月下旬的一天晚上，顾金坤负责带队巡逻，周德君站门哨。时已半夜戒严时间，一名国民党军官，金图仗势闯过岗哨，周大声喝喊“口令”！军官答不出，周就命令他停步，他不听，继续走来，周就打了一枪，他见势不妙，斜刺里拔脚就逃。顾金坤就借此机会向陆提出：“为陆止那军官纠众前来寻衅报复，应该立即带队转移出去，暂时回通一下，否则将对自卫队不利！”说毕，立即吹起紧急集合哨音，部队很快集中，陆家禄也只得带了队伍向南八灶方向出发。自此，周浦自卫队队部就转移到南市梢的中信布厂内，为策动起义创造了条件。接着，我们又向陆建议把枪支集中保管以便应付突变。陆同意后，立即命令自卫队集中，宣布将所有枪支集中到部队中来，今后不准带回家去，同时分派金关鑫、郭雪鑫二人专门管理军拔枪支。这批武器计有机关枪11挺、（其中一挺已坏，一挺在常备班）短中正步枪100支、汤姆枪2支、各种短枪4支、子弹、手榴弹10箱。

（五）胜利凯歌

1949年4月中旬一天中午，两名“警中”（江苏省税警中队）士

兵，在自卫队后门市河中强行拉捉民船，船民苦苦哀求，说待船上的粮米卸空后再去。士兵不肯，并用枪托殴打船民。群众无不气愤万分。不少自卫队员看着，也无比愤怒，咒骂道：“这些当官强盗”想抢米！把他们拉上米也打一顿教训一下出出气！我和郭、顾等也乘势激励他们：“下去，把这两条狗抓上米！”话声未绝就有几名队员跳到船上，夺过“丘八”手里的步枪，一边打耳光，一边将他们拉上岸米。于是你一拳，我一脚地将两名家伙打得直喊救命，再三求饶后才住手。结果他俩拔脚就逃，枪也不要了。此时我们就提醒大家：“他们逃回去，必定向官长哭诉，如果带队米兴师问罪怎么办？有的说：“我们手里的枪打不死人的吗？他们敢米，我们就跟他们拼！”顾金坤就吹哨紧急集合，整队出发。顾伯坤扛起枪，郭雪鑫紧跟在后，队伍走出大门，顾叫大家分散伏在公路两旁的马路沟内，我和郭守在机枪两边，必要时，可立即指挥和“国军”接大作战，乘此边战边撤，由后门渡河拉走队伍。可是，很快被陆家禄得悉，便会同肯年军搜索营长邱水亭（周浦大流氓邱生泉的儿子），先至“警中”打招呼，然后一同赶米。见自卫队预伏在公路两旁如临大敌。便挥手令大家回去，到队部站队训话。此时有些队员还是金怒未息，咒骂“当官强盗！抢米！”结果这一场风波，算是暂告平息。

在痛殴顽军后约七天后的一个上午，自卫队员朱八官，驾驶一辆“哈莱”摩托车到自卫队门口，好多自卫队员簇拥在摩托车周围，争先坐上摩托车南北来回疾驶。此时我在站大门哨，对他们说：“摩托虽快，也追不上小吉普（军用美式吉普）”。顾金坤窜出来：“我不服气。”便拉金炳良坐上摩托等候小吉普到米追赶！不多时，见一辆小吉普由北向南飞快驶来，经过自卫队大门后，小朱即路足油门飞也似的追上去。追至沈庄南面时，已超出吉普。不料吉普车上跳下几个士兵，喝令他们停下，并缴去了他们身上的武器。原来这吉普车上坐的是县长孙运追和青年军敢司令。当即传下命令：“回去告诉陆家禄，叫他明日上午去县政府向他陪礼道撤”。翌日，陆怎么也不敢去南汇，他一方面马上挽人去南汇向孙运达打招呼说情；一方面备公函叫顾金坤等去南汇恳求孙运达发还昨日被缴的三支短枪。当日下午，孙派二名士兵来周浦，命令陆立即交出驾驶摩托车的小朱，还要交出小朱身上佩的一支白郎宁手枪、哈莱摩托车和 20 根金条，说是慰劳他的士兵，否则，立即派兵来撤自卫队枪

支！至翌晨，孙真的派两辆装甲车停靠在自卫队门口南北各约 50 公尺的公路边。顿时气氛非常紧张，陆家禄吓得脸如土色，除了继续挽人向孙运达求情外，他再也不敢到自卫队队部来了。也不敢出头露面在街上行走了。每天一早，一溜烟跑到大同铁工厂（自卫队后门对岸）里面，在一间小房内藏有和各商董机关联系的电话小总机上偷听各单位电话（有关这一事件消息）。此时，我们即派郭雪鑫向张震言同志汇报：“周浦自卫队面临突变，我们的部队在近日内应守候在周浦东商接应自卫队起义”。

1949 年 4 月下旬的一天早晨，陆家禄得悉由他派去向孙运边求情的人回来说：“孙运达很恼怒，看来情况不妙”。因此，陆一夜未眠。清早就潜来小总机上，听取消息。突然，电话铃响，他拿起电话，听到孙运达和周浦镇公所总务王庆云在讲话：孙说：“命令陆家禄今日上午 10 时前交出小来、手枪及哈莱摩托车和二十根金条，否则再派 5 辆装甲车来缴自卫队枪”。这一下，陆吓得魂飞魄散，于是，他匆匆奔出大同铁工厂，急忙唤船过渡。到自卫队队部，进后门一看，只见郭雪鑫、顾金坤等拖住二名“国军”，你一拳，我一脚地打得直喊救命！陆见情，急得双脚直跳，立即命令“停手”。大家闻言就此放手，二个士兵乘机没命就逃。陆就将听到的消息告诉了大家，大家都劝他下决心“走”（起义）。此时我们挺身而出，大喊：“跟我们走！”陆表示同意。顾金坤吹哨紧急集合，集合后即命令全体队员带好所有武器立即出发。我们不愧不忙地将预先已捆好的枪支弹药，抬至后门口，由郭雪鑫、顾伯坤去对岸摇来两只罾泥船，将金部武器装上小船。陆家禄如梦初醒，立即把船作为浮桥，金部队员过河后，由顾金坤领队，出商八灶后街，走祝家港沿河边向东南方向进发。这时我主动去站最后一岗哨，掩护自卫队撤走。时正上午十时，后来有人来自卫队，便说：“自卫队奉命出发，下午归来，现在不准任何人进入”。我当对横枪实弹煞有军威。下午一时之后，我将军装于弹带做成活结，衣钮逐个解松。下午三时早许，只见南面驶来 5 辆装甲车，在前面二辆驶过自卫队大门时，装甲车上在扬红旗。很明显，命令后面车辆停下来。此时，我便悄悄溜进大门，直奔后门，脱下军装，将步枪子弹藏入水桥底下河中后，急忙渡河，走后街出祝家港摇长而去。此时，只觉得心情舒畅，奈不住口中哼起了新四军五

参加泥城暴动等革命活动回忆

王妙仙口述

1912年，我出生在现泥城乡千祥村的一个农民家里，父亲王效文原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常年吃素，为人慈善。后在吴仲超、沈千祥等同志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曾任中共南汇县委委员，县农民协会主席等职。

记得在我十六岁时（1928年11月），中共大团区委在我家开会（当时我父为大团区委书记），会上道过了沈千祥、吴仲超提出的关于发展女共产党员的建议。于是在沈、吴的介绍下，我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区委里分工搞妇女工作。

我入党后，认真接受党的教导，积极参加党的各项活动，平时和许多妇女在一起劳动时随时宣传革命道理。内容是：劳动大众一定要组织起来，掌握枪杆子，打倒军阀、土豪劣绅，达到耕者有其田，生活才能好起来……。

另外，我还参加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的工作。标语大部分由姜文光、委文奎两兄弟在晚上写。开头，我因文化低，字写得不好而不敢，后来领导鼓励我，说只要写得人家认得出就行了，多写了会提高的。所以，后来我也一起书写标语。标语的内容记得有：贫苦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标语写好时，一般都已午夜十二时后，接着就分头去张贴。我一般在泥城、横港一带张

支队在李家桥大捷的战歌。

自卫队很快和等候在那里的我浦解“英勇”中队胜利会师，随即向老宿营地进发。我也道过我军联络站，找到了武工队一同回到部队，第二天下午，我向张震言中队长、王克刚政委汇报了胜利完成策反周浦自卫大队起义的经过情况。（周克平整理）

1992年3月9日

贴，大多贴在人家的门上，树上，墙壁上，也有塞进人家的门缝里。直到凌晨二、三点钟才回家。传单的内容是由沈千祥、吴仲超、姜文光等编写，铜版刻印任务由一位共产党员叫吴阿三的负责，他是泥城小学的炊事员。他印好后，就交给我去散发。一到深夜，我就把这些传单塞进人家的门缝里或猫洞里。

1930年阴历六月初，省委巡视员黄理文和沈千祥、王效文等一起召开区委会，检查各项工作的准备情况，群众的思想发动情况，黄认为武装暴动可以进行，提出于六月初十开始行动。当时有人提出初十月暗，是否推迟到十五，既是月亮，又有利于准备工作的充分。最后就定在阴历闰六月十五举行暴动。

泥城暴动的前期工作是大量的、其中由我参加的有：一、标语。用红绿纸裁成 2×0.5 尺，上面画上镰刀、斧头，下面写上标语、口号，再用三尺左右的芦头，把标语的右边用浆糊粘在上面，成为长方形的小旗，一共做了四百来面，在暴动前发给战士。

二、绣红旗。由我和二姐王妙如（也是共产党员）负责。一共绣了两面。是用两块 2×3 尺见方的红布，先由姜文光在另外的黄布上画了镰刀、斧头的图样，剪下后贴在红布上，再用黄色十字线绣制面成。

三、教唱革命歌曲。由我和二姐负责向战士、群众教唱。如《亲爱的农民团结紧》、《大家结齐心》、《十二月花名歌》等，都是唤起民众，团结战斗，打倒土豪劣绅、军阀帝国等内容。由于曲调都是借用“春调”、“无锡景”等民间小调，所以群众易学易唱，容易传开。

四、武器。有二枝短枪，是由吴仲超同志从上海领取后，把它包在最糖里，再用红纸贴在上面，象送人的包扎头那样，冒着风险送到了我家。另外还搞到四支枪。其他大部份武器是锡头、铁搭、杠棒、铁撬等，做到人手一件。

1930年8月9日（即阴历闰六月十五日）天气晴朗，晚上月光特别明亮。近十点钟，从四面八方来的战士，集合在小沥港两朱大椿楼房的面南角田头。待人到得差不多了，就编排队伍，每30人一个横队，面南背北东面排列，一共有十个横队，约300多人。

第一个讲话的是省委巡视员黄理文，第二个是沈千祥，随后是姜文光，还有二姐王妙如和我都讲了话。黄理文讲的是暴动的路线和战斗方

案，先打盐廐和孙家保卫团，夺取枪枝，再打警察分局，才后打入大地主诸心田宅院，建立苏维埃政府，再向县政府进军。

革命队伍在我绣的那面红旗的引导下，雄纠纠气昂昂，浩浩荡荡地向东北方面前进。

我和二姐的任务是去把贫苦农民集中起来，为分地主的粮食、土布等作准备。我们在革命队伍出发后立即行动起来。一路上告诉群众，革命暴动开始了，大家要团结一致，夺取革命的胜利，共享胜利的果实。群众听了都很振奋，有的关上门跟在我们后面，一路上边走边宣传，还教大家唱起革命歌曲，队伍不断扩大，经彭镇到泥城时已有三百余人的队伍。

当夜，革命战士很快的打下了盐廐及警察分局，天亮时已进驻地主诸心田的大院，此时一些反动头目及地主都已溜之大吉。我们的队伍与战士们在大院会合后共庆胜利，一方面把地主的粮食、钱物分发给贫苦群众。沈千祥、姜文奎等同志正积极研究下一步的行动。

此时，消息传来，南汇警察局已派武装警察赶到横港。同时，已调集大批兵力向泥城袭来。经领导决定，叫大家暂时分散，大部群众先各回家，一部分主力立即转移至海边芦苇荡里隐蔽待命。

我和二姐都没有回家，睡在邻居家里。暴动后的第三天，由于上级没有援兵，这次武装革命没有成功。而国民党就四处搜捕革命同志并张贴布告，这时各负责同志都分别出走上海等地。我们一家五口（父、母、姐、弟、我）也决定暂时回避，我们从泥城出发，走小路经万祥，黄路，到南汇时已是半夜，我们一家人先在南门那棵大银杏树下休息，记得我和二姐还曾携手试着抱过这棵大树，终因相差太大面惊叹这棵银杏的无比粗大。后来一家人继续赶路，至祝桥吃素朋友顾成亮家时已天亮，那天全家只睡了二、三小时就赶到上海老西门韩常德家，韩因事先已知道我们要去而已在辣斐德路（现复兴中路）三德里16号租了一间前楼，里面已安排好了床铺、煤球炉等用具。后来姜文光、姜文奎二兄弟也住进了我家的后楼。

在那里住了三天后，原省委巡视员黄理文同志来到我家，谈到这次泥城暴动虽然失败，但主要同志均已安全转移。目前只有暂作隐蔽，以待时机。同时援到团省委机关需要一位女同志担任机要通讯员。但必须

以他夫妻的身份出现，一方面可以租到房子，同时也可以避人耳目。决定推着我去担任这一工作。当时，我觉得不好意思以这种方式去工作，但想到入党时说过服从党的分配的誓言，便说服父母毅然接受了任务。当时，我二姐被安排在曹家渡正泰纱厂做工人。

后来，我和一位姓沈的以一对青年夫妇的身份租到了房子作为团省委机关。假丈夫白天出外工作，晚上回来写文章或召集同志开会。我负责烧饭，烧茶，招待革命同志，还经常外出送信。为了确保“机关”安全，所以“机关”经常搬迁。有一次，楼上正在开会，我在楼下大门口当警戒。突然有位同志前来报信，说出了叛徒，要我们赶快转移。我急忙上楼通知开会的同志。大家匆忙转移后，我不小心从楼梯上跌了下来，损了腰椎骨，痛得爬不起来，幸亏亭子间的一位叫新姐姐的把我扶到楼上，当时无条件就医，就卧床多时，我的腰就一直弯着直不起来。解放后，去上海医院推拿，说已无法治好，现在已成了一个常年弯腰90度的残废。

那时，党的活动经费相当紧张，大都由革命同志自己凑。有的同志家里比较富有，就向家里要。钱汇到“机关”，由我负责转给他们。有一次我收到一封信，拆开一看（沈同志规定我可以拆阅一切来信），里面只是一张白纸。等沈回来把信交给他，只见他用一枝特殊的笔沾了水向信封上一抹，字就出来了，那是封苏联方面的来信，内容是请沈到指定的地方去领取经费和武器。半年后，姓沈的出去后一直不来“机关”，我还是留守在那里。二房东催着交房租，我回家向父母要了钱交了房租。又过了一个月，沈还是不来，我只得把机关里的家具请姜文光帮忙搬到典当去当掉。回来时，正巧碰到沈，他说一直在北京开会。我把当票和钱给了他，他给了我两块钱，说这里暂时停止活动，叫我回去另找工作。临别时还给了我通讯地址。记得他是杭州人，具体地址忘了，从此一直没有再见过。

1931年春，我和姜文光在上海结婚。我和他是早有感情的，早在泥城暴动前，他常来我家，后来在革命活动中常在一起，一次，他告诉我，他的父母要给订亲，他坚决不同意。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要你”！这使我羞得什么似的，一连几天避着他不说话，实际上我心里也是喜欢他的。由于当时的工作紧张，没有提起婚嫁之事。后在上海，我

漫谈淞沪游击第五支队、新 四军淞沪支队各部的名称及其他

鲍季良

1940年我第二次回浦东工作时，在我淞沪游击第五支队辖区内搞地方教育工作，有时应支队长连柏生同志之邀，到支队部起草文件，因去的次数不多，对部队情况所知甚少。1941年9月，我调到支队部任秘书，兼南汇县一、二、三、七、八区联合办事处主任，对部队内情就知道的多了一些。1942年8月底至1943年6月我在浙东工作。1943年6月回浦东搞财税工作，与支队部一起活动，仍兼支队秘书。1944年秋，曾平同志来浦东任支队政治处主任以前，我还兼支队总支书记，与各中队干部接触多，对各中队情况了解较多，我不兼总支书记以后，不管部队的事，对各部的情况都是从旁听到的了。

俩继续交往，感情加深而结成终身伴侣。当时他在皮箱厂当推销员，我在申新纱厂当磅纱工。生活也算过得去。当时有不少革命同志经常来我家叙谈。记得有鞠火青、瞿剑白等来得较多。

在1936年，我们全家回到了泥城老家。1939年，为了纪念周大根等20多位为革命而献身的同志，我把自己的全部积蓄拿出来建道了一所汇角小学，使附近的儿童有了学习的场所。

抗日战争开始后，我自己身残不便参加革命，就一心支持丈夫投身抗日斗争。我在泥城家里务农，除抚养好二个儿子外还照顾好年老的婆婆，好使丈夫在前线无后顾之忧。

1941年，文光率队在浙江余姚推河镇与日寇作战时不幸牺牲，因我曾为革命而致残，组织上曾经多次要安排我工作，我都谢绝了。历年来我受到国家的照顾，人民的敬重，自己虽已八十出头，生活还能自理感到非常满足和愉快。

(张雪君整理)

1942年秋，由浙东调来六中队（四、五两个，中间二、三两个中队）的干部，与吴桂良等，袭击敌人。1940年，六中队在战斗中，中队干部死亡，中队中队长十五个，各中队人数在二十、三十人不等，中队干部在二十人。六中队以后并入五中队。1942年，六中队在战斗中，中队干部死亡，中队中队长十五个，各中队人数在二十、三十人不等，中队干部在二十人。六中队以后并入五中队。

1943年3月，调入浙东调回部队工作时，我浙东部队的负责人朱亚民同志已提升为五支队支队长，所属部队很小，原来由朱带回十一人的短枪队已成为拥有机枪、步枪的长枪队，有四、五十人，分成四小队（班），各小队有小队长，没有区队长，以后才陆续从浙东调干部来当区队长。四个小队合成一个中队，称为“一中”，中队长是浙东调来的翁阿坤，后改名翁利民。政指是地方党员、大团人张正贤。这“一中”经常和支队部在一起。支队部很小，干部只有朱亚民和我两人。此外，还有黄志英的“特务大队”，活动于奉贤县西部，实际人数只有二、三十，其中没有党员，他们有时回支队部，但我们没有完全掌握住他们。

1943年下半年，赵熊、杨明德、徐黎先后从外地来支队部，都没带组织关系，经过短时期对他们了解后，派赵熊打入“特务大队”把“特务大队”一部分人留下来，再加入从“一中”抽出的几个人，组成“特中”，以赵熊为中队长，名义属“特务大队”，与支队部一起行动。是年冬，我和杨明德去南汇城东南的谈家店活动，筹组常务大队，到1944年春的北宋战斗时，已有三、四十人，大队长杨明德、大队副王利生，下有从浙东调来的中队副庄平，也和支队部一起行动。徐黎调入“一中”任文化教员，到成立“六中”时为止。

1944年北宋战斗后，派从浙东调来的张锡祚去常务大队主持工作，杨明德改任支队部作战参谋。四、五月间，朱亚民搞统战工作成功，把吴桂良的三、四十人、枪拉过来，成立“六中”，中队长为吴桂良的徒弟倪德庚，并派徐黎任“六中”政指，实际掌握这一部队。我们所以称这新部队为“六中”，并不是因为上面还有二、三、四、五中队，说穿了，还是为了夸大自己，欺骗敌人。

经过一个时期，为了保密，使敌人摸不清我们情况，大家觉得我军各部有改用代号的必要。于是朱亚民和我，还有几个中队干部，七嘴八舌，七拼八凑，一起为各部命名。因“一中”战斗力最强，称为“英勇”；

“特中”也不错，称为“顽强”；常备大队也已成为主力，因为好名字已被“一中”、“特中”用去了，就取名为“紧张”。“六中”成立不久，取名为“积极”。后来建立的新六中称“神鹰”。老六中称“雄狮”等。

1945年春，我支队部和三个主力去浦西以前，各部又改换代号，原“一中”作战可以“笃定泰山”地取得胜利，就称为“泰山”；“特中”、“常备大队”也用五岳的名称，分别称“华山”、“衡山”。这三支部队都正式升格为大队。此后，浦西的几个部队也就用“山”为代号，如“黄山”、“崂山”、“舟山”等等。留浦东的部队仍用抽象名词作代号，如“灵活”等等。以后浦东为了开展工作，成立南汇县的警卫中队和区中队等部队，有没有用代号，因我已在浦西，不知道。

我兼部队总支书期间，干部来队，一般首先由我接谈，从外地来而没有正式组织关系的同志都自我介绍在外地的经历，所以我对他们了解较多，关系也搞得很熟。徐黎还向我汇报：在新场遇到王思恒（邓肖望）、来慕康（即朱醒民）的情况，并说这二人可能是我党党员。因为我是支队部秘书，平时和中队以上干部接触也多，这些人的音容笑貌都深印在我脑海中。朱亚民用统战关系搞来的干部周子平、倪德庚等由朱自己接谈，所以了解不多。

曾平同志来浦东以前，从浙东调来的干部，除上面提到的以外，有“一中”队副濮报林，“一中”区队长陈良，患口吃的嘉定人朱×区队长，支队部会计鲁明（女），政委陈大刚等；政委姚三林、鞠涛二人也都从浙东调来，姚较早，鞠较迟，来时我已不兼总支书记了。张席珍一九四四年五、六月间从浙东带来的干部有参谋杜锐、电台报务员王光、译电员周岚、卫生队卫生员陈也男（女），俞叔平（女）和小俞（女）。以上几个中，濮报林行为不检，被革职；陈良在外搞男女关系，回来后又扰乱军心，被处决；来×在第一次朱家店战斗中牺牲；陈大刚于1944年秋，在锄奸工作中，与伪坦直镇长姚崇生搏斗时落水牺牲。在原队伍中提升的中队以上干部有奉贤县征收主任卫民；“一中”队副张保生。张在1944年秋储家典战斗中牺牲。本地调来的干部有张正贤，后牺牲。后来的政指陈友新（原名吴掌林，由陈伯亮陪来，我开玩笑地给他取化名：既陈又新的“陈又新”，后改“又”为“友”）和支队部军需来梵，统战关系来的周志平先在支队部当副官，后和卫民被派往温州买军火，因

记一次特殊的露天宿营

陈友新

1944年8月28日下午，我们新四军淞沪支队获得情报：有周浦一个中队四十七名日本鬼子在南汇、新场敌据点的鬼子配合下，准备到六灶一带“扫荡”。支队领导张席珍、朱亚民等研究后，立即紧急部署，严密安排，坚决进行伏击。

在温州嫖妓，怕卫民回来揭发，也想拉卫下水，回队后，被卫民在会议上当众揭发，周被处决。倪德庚请假在外面养病时被日寇所杀。原“特务大队”长黄志英在外胡作非为，因和奉贤县征收主任卫民一起行动，黄怕卫回队揭发，于1944年初，乘朱亚民同志去浙东开军政大会时，黄杀卫民后叛变。和黄志英一起的中队副陶少卿表现较好，调往浙东学习，后在战斗中牺牲。“六中”的副政指范琪和我很熟，是曾平同志来后提升的；“六中”的政指顾子荣也是后朱调朱的，我对他就不清楚了。

1944年秋，曾平（和曾平一起朱的还有政清干事盛理予）、金子明、吴建功三同志从浙东调朱后不久，姜杰同志来队宣布五支队的番号正式改为新四军淞沪支队。政委姜杰，支队长朱亚民（对外仍用请亚民）、政治处主任曾平、参谋长张席珍，下面干部无变动。改番号时还出过布告。是年冬，苏北调来陈伟达，任支队政委，姜杰改任副政委，其他支队级干部无变动。同时调来的有专员顾复生、张锡祚大队的政委雷鸣，支队部供给处主任余恨生，陈和顾的几个警卫员到浦西后都先后提升为中队干部。

北宋战斗时，支队部的非战斗人员和当时还没有战斗力的常备大队，朱亚民同志要我率领先行撤离宿营地，单独行动。同我一起的干部有杨明德、徐黎、庄平。支队部的“小鬼”潘海根年纪很小，我们常叫他装做割单的农家小孩，在村外放哨。庄平是在这次行动中因病出外休养，被日寇逮捕而牺牲的。

1989年3月4日

下午，鬼子在六灶酒醉饭饱后，出发途经六灶西南朱家店的伏击圈内时，我军立即拉响土地雷（以十多颗手榴弹，打开保险，拉出发火线，连成一线而分散埋放），在轰轰声中，鬼子的队伍顿时血肉横飞，四散逃窜，我军四面围歼，经过不到一小时的战斗，歼灭鬼子41名，并缴获各式枪枝三十多支，弹药四百发以及其他军用物资，鬼子逃跑了几名。我军以亡一伤三的代价，大获全胜，这是在浦东抗战史上最辉煌的一次胜利。

这次朱家店伏击战，大大激怒了敌人，于是大举调动兵力，进行全面扫荡，并临时增设敌、伪据点，加强岗哨枪查，控制水陆交通。对我们来说确是形势严峻，但也在意料之中，所以支队领导在随时了解敌情，掌握敌、伪动向的基础上，作好种种应付扫荡的对策。

不久，支队长朱亚明同志率领一中，特中二个中队去了浙东，参加新四军浙东纵队军政大会，留在浦东的部队，采取适当分散的策略，如六中队随支队部活动于川、南边境；常备大队活动于南汇扩东一带，西且经常流动，远离我们以往常驻的地区，以减少目标，敌、伪军始终找不到我们。但由于敌人岗哨密布，扫荡频繁，我们的处境确是困难。我们的常备队与支队领导也经常失去联系，平时与我们关系较好的群众也不敢随便与我们接近。所以对敌情的了解不够。对此，我们只有散好隐蔽工作，避开敌人的锐气，不随便交锋战斗，同时，在驻地尽力向群众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以取得支持。

有一次，我们在小洼港附近，发现情况严重，为了确保安全，避免暴露目标，决定不住在农民家里。待到夜深人静，部队迅速出发。由熟悉当地地形的同志带路，沿着小路，再走田埂，在凌晨二时许，在一块玉米、黄豆田里进行露宿。真是“戴月披星走田埂，餐风露宿湿衣裳”。当时玉米已摘，玉米杆还留在地里，黄豆已长二尺高，我们的常各队在这里休息，真是神不知鬼不觉。我们的岗哨，随时警惕着外面的情况。我们能看到外面，而外西却看不见我们。同志们都安心的得到了充分的休息。为了确保安全，白天继续隐蔽，早、中饭都不吃，直至傍晚，才派人到农民家里买米买柴烧夜饭。后来根据情报，敌情已缓和，我们才走出了玉米田，仍按常规进行游击活动。

这次整个中队露天宿营农田里，对我来说确是唯一的一次。